



# 论车尔尼雪夫斯基



向叙典

甘肃张掖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 论车尔尼雪夫斯基

向叙典

甘肃张掖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一九七九年三月

## 论车尔尼雪夫斯基

任何一个革命的时代，总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诞生她的伟大的儿子。十九世纪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平民知识分子阶段，诞生了她的伟大的儿子，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民主革命而战斗，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十九世纪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他不仅有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才能，而且具有崇高的革命气节和一付革命硬骨头：宁愿坐监狱、服苦役、被流放达二十多年，而决不向反动的沙皇政府屈服。他的著作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上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著作和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崇高评价。

如何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在是否应该肯定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的。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中指出：

“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毫无结果。’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

是极端愚昧幼稚，也许闭塞无知，不能根据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要不然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做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们，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末，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做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有什么分歧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322—323页）可见，只要略微有点儿革命气味的人，都会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肯定的评价，都会对革命导师给予了崇高评价的这位历史人物怀着由衷的敬意。诋毁和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不是愚昧透顶的蠢人，就是维护反动派利益的坏蛋，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列宁指出：“我们不赞成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列宁全集》第20卷第58—59页）林彪、“四人帮”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板起一付极“左”的面孔，挥舞棍子，装出一付要把人们赶上天堂的架势，掩盖着要把人民打入地狱的险恶用心。就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能幸免，他们不作任何历史的分析，硬给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扣上“剥削阶级的辩护士”的帽子，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当然决不仅是因为他们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而是这伙混入革命阵营里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从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进而猖狂地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

种丑恶表演；同时，也是他们确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死敌，无产阶级的死敌，人民的死敌的又一铁证。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592页），一八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一个宗教职业者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神甫，地位较低，头脑清醒，勤劳而严肃。他家里的藏书比较丰富，这为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勤奋自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的平民的身分和家里不很富裕的生活，使他从小就有可能接触劳动人民，认识农奴制下俄国的极其丑恶的社会现象；民间流传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和布加乔夫的歌曲、传说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刻的影响。这一切，使他后来能够轻易地识破反动统治阶级散布的种种漂亮的谎言，挣脱有神论的枷锁，树立唯物主义的思想。

一八四四年，十六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进入“正教中学”时，已通晓拉丁、希腊、法、英、犹太、波兰等几种语言。一八四六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将来不从事宗教职业活动，考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学习。大学的生活扩大了他的视野。一八四九年二月，他开始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的学说强烈地吸引着他勤奋地、再三地、深入地去钻研，他能把费尔巴哈的著作整页整页地背诵下来。这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促使他彻底清除了过去所受的有神论的教育的影响，摒弃了唯心论的说教。从这时开始，一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他是马克思以

前的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忠实的学生。费尔巴哈的学说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整个世界观提供了哲学基础，是他进行各方面斗争的革命武器。他用它批判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胡言乱语，从事美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并且用它指导自己投身于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民主革命的洪流，有计划地向农民宣传暴力革命的思想，把农民动员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一八五〇年五月十五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里表示他准备向农民散发革命传单，在传单里，决心“写出实际情况，并且写出只有用武力，只有他们自己使用这武力，才能使他们获得解放。”

一八五〇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以后，回到萨拉托夫，在一所中学里担任语文教师。在和奥尔珈·索克拉托夫娜·华西里结婚以前，他就向他的未婚妻说，他可能因为革命而遭到毁灭，但是，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使他抛弃革命的理想。结婚以后，他就去彼得堡在第二士官学校任教，同时写他的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在彼得堡这一时期，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中革命活动的最主要的时期，他先后在《祖国纪事》、《同时代人》两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政治、文学等各方面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才情并茂的革命文章，成为当时俄国站在农民方面的极少数革命家的领袖和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7页），为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时期，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声名狼藉的农奴制改革前后。这个时期“一切社

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128页）因此，我们必须简略地回顾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社会历史环境，以便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加以观察。

英法两国的农奴制，早在十四、十五世纪已经大体瓦解。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一六四九年，沙皇阿列克赛·米海依洛维奇还在颁布《会典》，从法律上确立农奴制。农奴虽然不同于奴隶，但相去无几。农奴被固定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除耕种自己的一小块份地维持牛马般的生活之外，每星期至少必须无偿地给地主耕作三天；不服劳役，就要交付免役钱。农奴没有人身自由，是领主的私有财产；领主可以把农奴赠送给别的领主，也可以自由买卖农奴。沙皇卡德琳娜二世赏赐给贵族的农奴就达八十万之多！农奴的价格因年龄、性别、体格和技能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十八世纪后期，农奴的少年姑娘每个的价格是十卢布，而一条纯种的小狗的价格竟达几百至几千卢布之巨！农奴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不断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十七世纪的拉辛和十八世纪的布加乔夫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就是其中的杰出的例子。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农奴制内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增长。一八〇四年，俄国工场的数目是二千四百二十三所，工人九万五千余人。到一八五八年，工厂数目是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九所，工人五十四万九千人。这表明在这五十四年中，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工人人数增加了五倍。但是，与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英法德等国相比较，农奴制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



生产力的提高是很缓慢的。例如，在十八世纪末，俄国和英国的生铁产量是相等的，但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的生铁产量仅为英国的十五分之一，法国的三分之一。一八五五年，法国铁路总长五倍于俄国，德国铁路总长六倍于俄国。这说明封建农奴制严重地束缚着俄国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足够数量的、自由得一无所有而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成商品来出卖的自由的工人，而农奴制下的农奴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阻碍着自由劳动力的市场的发展；要求农村提供大量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而农奴制下的土地被地主和沙皇政府占有，农奴生产情绪低落，地主只愿意加强封建剥削、无偿地占有农奴的劳动果实，根本不愿意改进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就限制了资本主义农业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顺利发展；要求工业产品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而农奴制却造成了农村凋蔽，无力购买工业产品，限制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地主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奋起反抗。据不完全的统计，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五四年间，共发生农民暴动七百零九次，次数逐年增加。凡此种种，说明铲除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封建农奴制，已属历史的必然。

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面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持不同的态度。农民坚决要求废除农奴制，他们用不断地举行暴动来促进这一历史的必然进程，迎接自身的解放。据沙皇的第三厅的统计，一八五八年农民暴动八十六次，一八五九年九十次，一八六〇年一百零八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慑于农民



起义的威力，感到与其被农奴推翻，不如作某些改良来缓和矛盾，以维护地主阶级的腐朽的君主专制政权。他告诫莫斯科州的贵族说：“从上面来解放农民，要比等待从下面的解放来得好些。”贵族地主中的愚昧透顶和顽固已极的分子，坚决反对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在他们看来就意味着他们赖以生存的“魂灵”（Душа—农奴）远走高飞，即他们的末日的降临。即使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改良行动，他们也加以反对。他们七分真情三分恐吓地说：“沙皇的大王冠是由我们的小王冠组成的；打碎了我们的王冠，也就打碎了沙皇自己的王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真诚地拥护沙皇的自上而下的所谓“解放农奴”的措施。他们感到幸福的星辰就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金苹果将源源不断地滚进他们的腰包，地主的“魂灵”将转化成为他们自由地剥削的材料，他们即将因自由地吸血而脑满肠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截然相反，坚决站在农民一边，极力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摧毁农奴制和农奴主阶级的一整套国家机器，决心不顾一切艰难险阻，投身到这一民主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人民对政府、对赋税、对官吏和地主的不满情绪正日益高涨。只消星星之火，就可以使这一切燃烧起来。同时，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敌视现存制度的人数也在增多……如果爆发革命的话，……我一定参加进去，……不论肮脏也好……杀戮也好，都不能将我吓倒。”一八五九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迷信和逻辑规则》一文中，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农奴制是削弱民族力量的制度之一”，“是人民贫苦的唯一根源”，是使俄国“一切方面都

落后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能容忍农奴制继续存在下去，非革命不可。

一八六一年三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希望既不摧毁沙皇君主专制制度，也不摧毁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政权的自由派的一片掌声中，宣布“解放农奴”，废除农奴制。但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是把农民抢得精光的一场丑剧。为了获得“解放”，农民被迫“赎回”他们自己的土地，而被勒索去的赎金却远远超过实际的地价。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五八年农民的份地实际价格不过是五亿九千四百万卢布，而后来付出的赎金总数竟高达八亿六千七百万卢布。黑土带各省农民的土地在“改革”后有五分之一被割去；有的省分农民被割去和被夺去的土地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改革的全部狭隘性和农奴制的实质。“车尔尼雪夫斯基懂得，俄罗斯的农奴制的官僚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解放农民，就是说，没有能力推翻农奴主，它只能闹出一场‘丑事’使自由派的利益（赎也就是买）和地主的利益达到一种可怜的妥协，这种妥协以温饱和自由的幻影愚弄农民，事实上却使他们破产并受地主宰割。所以他反对这种改革，咒骂这种改革，希望这种改革不能成功，希望政府纠缠在它那向自由派和地主两面讨好的把戏中而一败涂地，从而把俄国引上公开的阶级斗争大道。”（《列宁全集》第1卷第260页）后来，他在小说《序幕》中，通过沃尔根之口，把那些在革命面前心惊肉跳、在统治阶级面前奴颜婢膝、为一八六一年的臭名昭著的“农民改革”而大唱赞歌的自由派斥之为“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

一八六一年的所谓“农民改革”，不但没有满足农民的

土地要求，反而使农民受到了一次洗劫。农民运动继续发展，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三年间就发生了近两千次农民暴动，但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正确的领导。“善于通过被检查的文章来培育真正的革命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全集》第5卷第22页），“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5页）他力图把广泛的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一八六一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的革命传单，揭露沙皇和地主狼狈为奸的阴谋活动，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彻底消灭农奴制，并且深刻地指出：“假如只有一个村庄发生暴动，而其它村庄却尚无准备，这有什么益处呢？这只能意味着事业的失败和自身的毁灭。”一八六一年，俄国当时的先进分子，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思想的鼓舞下，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积极开展民主革命的宣传活动。一八六二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下了闪烁着阶级斗争光辉的著名论文《没有收信人的信》（马克思很重视这篇文章，通过俄国友人丹尼尔逊得到了这篇文章的手稿，并且几乎把它完全翻译成德文，还作了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1卷第18—20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54页）。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论文里，明确地提出农奴的解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应该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情”，“自行处理自己的事务”；猛烈抨击农奴制下的俄国的现实，他指出：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向社会各

阶层暴露了社会在战前所处的那种制度的无能”，“支配我国力量的机构的无能”，“农奴制度当然包括着许多舞弊”，引起“凶残、贪婪或暴虐的事件”，“对于农奴是沉重的，对于国家是有害的”；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所谓“改革”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尖锐地指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在废除农奴制度的形式之后保存农奴制度的实质。”所有这一切，使得农奴制的拥护者和自由派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或造谣滋事，或投书告密，诬蔑和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害人的煽动分子”、“疯狂的蛊惑分子”、“亡命之徒”，要求沙皇专制政府镇压车尔尼雪夫斯基，“以维持普遍的安宁”。

一八六二年五月，彼得堡发生了几次大火。沙皇政府及其走卒利用这几次大火，大搞阴谋诡计，散布流言蜚语，硬说大火是革命者故意放的，借以打击和诬陷当时俄国革命者公认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七月七日，沙皇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囚禁在彼得堡要塞。身系囹圄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惊人的意志，在一百一十二天（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一八六三年四月四日）的时间里，写成了闪耀着革命民主主义光芒和充满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近四十万字的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一八六四年五月，沙皇政府用伪造罪证的卑劣手段，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褫夺一切公民权，服苦役七年，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妄图以侮辱性的假死刑来贬低伟大的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但是，效果却和反动统治者的主观愿望相反，激起的是人民对沙皇的憎恨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情和爱戴。人民不仅以热烈的欢呼迎接他进入广场，而且当他从广场被带

走时，人民还把鲜花投送到他的囚车里。

西伯利亚的苦役和流放，没有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动摇和屈服；在沙皇反动政府的野蛮迫害下，他的革命精神放射着更加灿烂的光辉。他坚贞不渝地忠于自己的民主革命的信仰，并以顽强的毅力和高昂的革命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可能采取的方式，继续从事革命宣传、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著名的长篇小说《序幕》就是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写成的，其手稿由他的友人辗转带到伦敦，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于一八七七年英国出版。后来，列宁常常在他的光辉著作中引用《序幕》的内容来说明俄国六十年代的事件。沙皇政府妄图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妥协，引诱他写赦免申请书，败坏他的声誉。他们曾派一名宪兵军官带着事先写好的赦免申请书前往西伯利亚，并对他说如果他在赦免申请书上签名，就可以获得释放，车尔尼雪夫斯基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责问道：“我为什么要请求赦免呢？！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所以被放逐，只是因为我的头脑和宪兵长官雪瓦洛夫的头脑结构不同，难道要为这个请求赦免吗？！”显示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

马克思获悉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消息后，非常愤慨，曾“想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个性等写些东西发表，以期在西方引起对他的同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49页），宣传他的功绩，后因马克思的俄国友人未能为他收集必要的资料而搁笔；他还热情赞助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积极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当阴谋家、野心家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及其走狗涅恰也夫之流，大肆攻击车尔尼雪夫斯

基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竭力保护他，明确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俄国革命运动的“思想鼓舞者是现在正在西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并称他是“在俄国吸引青年学生(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冒充是他们的代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贡献最大的人”，是“革命派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40页、449页、492页)；当巴枯宁及其走狗漫骂和诬蔑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所谓“不受欢迎的导师”、“想在科学、艺术的掩盖下把肥缺留给自己及其同流”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这种卑劣的无耻谰言予以痛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自己营得的肥缺就是俄国政府让他在西伯利亚坐牢，可是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而摆脱了这种危险的巴枯宁却只是从国外表现表现而已。而且正好在政府甚至严禁在报刊上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却对他进行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49—450页)。恩格斯还热情赞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勃夫是“社会主义的菜辛”，痛斥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则不过是骗子、吹牛的专家、不自量力的“癞蛤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92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对攻击和诬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丑，则深恶痛绝。

经过二十一年的监禁、苦役和流放之后，一八八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回到俄罗斯，移居里海之滨的阿斯特拉罕。直到他逝世的前四个月，即一八八九年六月，沙皇当局才准许他们心目中的洪水猛兽车尔尼雪夫斯基迁回他的故乡萨拉托夫。

在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晚年仍



然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写了不少的光辉论文，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主义，如在《生存竞争有益论的来源》一文中，极其尖锐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动的人口论，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是为了维护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反对任何改革而捏造出来的“恶劣的用心不良的著作”。他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第三版序言》，对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奇谈怪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后来列宁把它摘引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补充，并说他对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的批判达到了恩格斯的水平。

一八八九年十月十六日深夜十二点三十七分，伟大的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患脑溢血与世长辞。噩耗传到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他给俄国友人丹尼尔逊的信中沉痛地写道：“我们这里听到了尼·加·车·逝世的消息，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同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4页）。

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四人帮”及其帮闲们，象瞎了眼的小狗，不顾历史事实，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崇高评价，而肆意诬蔑他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鼓吹者、“资产阶级侏儒”、“剥削阶级的辩护士”……等等，这难道不正好证明他们和巴枯宁及其走狗涅恰也夫之流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吗？这伙在特殊条件下以伪装出现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有什么资格在具有崇高的革命气节的伟大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英灵面前哼一声呢！这一点我们姑且勿论。我们只想指出“四人帮”把活在人民心中的伟大的革



命家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险恶的用心乃是为进行宗派、分裂活动的目的服务,为他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他们继承巴枯宁及其走狗涅恰也夫之流的肮脏衣钵,企图用阴谋手段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实现其篡党夺权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反革命野心。

小狗对着大象狂吠,当然是自以为很有一点力量的。但是,人民不可欺,诬蔑也枉然。人民永远怀念在历史上有过卓越贡献的伟大革命家。一八六二年十月五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几百年以后,我们的名字还会使人感到亲切;虽然到那时候几乎所有与我们同时生活的人都已经被人遗忘,人们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我们。”历史的事实已经证实并将继续证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预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林彪、“四人帮”均已被人民的铁扫帚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我们以应有的崇敬心情纪念伟大的革命家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 二

“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8页)和“俄国的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是当时俄国最杰出的哲学家、卓越的经济学家、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在哲学上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以前的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学说。

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十九世纪的中叶，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极力宣扬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以维护沙皇专制制度，反对民主革命，坚持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思想体系。面对这种现实，要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就必须批判唯心论，坚持唯物论；不批判唯心论，不宣传唯物论，就不能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更不能使群众感奋起来，进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哲学，就是适应这种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他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种种成果，用科学的观点去探索他所考虑的一切事物，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他说：“凡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1876—1878年信札》）。他在这里所讲的“存在的东西”，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物。这些客观存在的事物组成在时间上永恒的、在空间上无限的物质世界。它不会消失，也不会重新产生；它不为神所创造，也不被神所毁灭，而是按照它本身的自然规律不断发展和变化。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自然永远照它自己的规律继续运行着，不知有人和人的事情、人的幸福和死亡；自然规律可能而且确实常常对人和他的事业起危害作用；但是人类的一切行动却正要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自然对人是冷淡的，它不是人的朋友，也不是人的仇敌：它对于人是一个有时有利、有时又不利的活动场所。”（《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学位论文）》）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形形色色的创世说和宿命论，捍卫了物质第一性、思想第二性的唯物论原理，坚持了人只能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而不能创造自然规律的思想；说明依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会无往而不胜，违反客观的自然规律，就要受到惩罚。